

重点
阅读

还有多少次“临终抢救”

□郑渝川



往在完成对旧有民俗、文化遗址的“改造”后才恍如大梦初醒，一下子发现了文化的商业价值、开发效益和政绩价值，于是，要么开始建造拙劣的仿古建筑，以山寨版本告诉人们某地某城“曾经阔过”；要么就开出巨额补贴，表现出对创意文化人才、项目和产业渴求的姿态。

譬如江苏南京。作为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多年来，南京在“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将历朝历代建造的许多古街巷和民居拆除。2006年，在名为“建设新城南”的城市改造中，南京将老城南仅剩的明清街区遗存，包括黑巷、颜料坊、牛市、洋洋珠巷、铜作坊等历史街巷拆除一空。此事曾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虽然后来南京的毁灭式拆改停了下来，然而，城里仅剩的大半个明城墙外壳和极少几条老街，怎堪人们凭吊六朝古都的情怀？

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发生在湖北襄樊（2011年改名为襄阳）。2007年4月，“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活动”在襄樊举办。主办方认为，刘备的三顾茅庐以及诸葛亮的《隆中对》，都是三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使襄樊成为三国文化的源头。当年7月1日，襄樊又举办了“国际关公文化研讨会”，许多与会者参观了传承千年、纪念关羽的襄樊古刹“汉圣庵”，并讨论如何保护修缮这座文物建筑。但仅在几日之后的7月6日，“汉圣庵”就遭遇强拆。多名拆迁人员以“偷盗”的形式进入“汉圣庵”，将守护人员捆绑后，强行用推土机推毁了庙内建筑。

正是出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焦虑，冯骥才以赛跑的姿态，奔走于中国大地各处，抢救、记录、发掘着各地民间工艺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理说，冯骥才应是那些自称很懂文化、很重视文化的各地官员们的座上宾，

他们理应热情地欢迎他，积极响应他的号召，保住本地的文化血脉。但是，冯骥才并没有真正获得多少支持，就在他奔走抢救的过程中，各地的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美术等成果，却在更快地被拆除和毁灭。纠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一个靠土地财政及土地项目运作获得利益的体制下，只要拆迁并改作其他用途的新建比保护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美术的效益高，地方政府的选择就几乎毫无悬念。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就显得更加具有典型意义。书中记录的虽然只是冯骥才运用多年来的文化抢救经验，通过“视觉人类学”与“口述史”等方法，对天津杨柳青历史上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进行拆迁前“临终抢救”的具体过程，但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保护和抢救整个民族文化遗产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画乡“南乡三十六村”曾有“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传统。过去，杨柳青镇曾分布有多家全国知名的年画大店，集中了大量雕版和手艺高超的画师。由于紧靠京津，受城市文化影响，杨柳青年画的审美倾向于市井文化。而在南乡三十六村，“境内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而过，地下水丰富，宜种小麦、玉米，养鱼植果；这里盛产小枣，又多蒲苇。枣木可以雕版，蒲草是造纸的天然材料，都是年画滋生的上好条件”。其中的炒米庄村，这个只有140户人家的小村子，年画店曾多达百家。南乡三十六村甚至形成了合作加工制作的产业链，“一些村里还有画铺和作坊，以印画为主，作坊里一般只印线版，余皆交给三十六村的农民填色描花，施粉开脸”。近一个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外敌入侵占领和政治运动之后，南乡三十六村的画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冯骥才前几年去发掘时，只

找到4位木版年画的艺人。村中宫庄子的缸鱼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永画店，就是大冯笔下的主角。

如果，杨柳青、南乡三十六村分布在本文开篇提到的一些重视民俗文化的国家，或者分布在近年来本土文化保护培育意识高涨的中国香港等地，相信那里的木版年画及相关艺人将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设法创造条件让其传承延续，绝不可能采取武断强拆整个村子的做法。但南乡三十六村偏偏就遭到了全面拆除的命运，冯骥才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仅仅只是帮助4位木版年画艺人中的王学勤一人，将其画室的一部分搬到龙门乡艺术博物馆。《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附有本次抢救过程中所拍摄的大量照片，也可以说，画乡“南乡三十六村”留给世人的回忆除了王学勤那个搬走的残缺画室，也就剩下这本书记百余幅“临终抢救”照片。

书中记录道，“这男子（南乡三十六村一位村民）对我含泪说，‘我们不就要这一点精神吗？有它我们心里就舒坦得多！为什么不给我们？……’”冯骥才只能感慨说，“他们被切断的不只是一个物质贫困的历史，还有他们世代代积淀在那里的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将失去记忆、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我们已经尽全力，把力所能及的事都做了。在‘城镇化’浪潮前，我们势单力薄；即使力量再大，也只是螳螂之臂，怎么可能去阻遏‘历史巨轮的前进’？我又想，还有许许多多遇到同样困境的文化传承，它们怎么办？”这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也是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果没有了文化传承，我们怎么办？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冯骥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出版）

书香茶座

看简明《佛痒痒》初稿的时候，被书密集的力量感吓了一跳，后来听说是白描先生推荐的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就觉得挺自然了。因为陕西作家有这样的特点不足为奇。一说到长篇小说，我们很自然就会提到陕西，自上世纪50年代后，中国的长篇小说一直和陕西同构，从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一直到今天的红柯，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地缘学表征之一。

读完《佛痒痒》的时候，发现它又很不一样。这本小说给人的是非故事性的阅读感受，描写生活的非逻辑状态。它与我们所认为的中国长篇小说那种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品格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佛痒痒》描述的是人在生存的挤压之下爆发出来的邪性与传奇的力量，中国人都遭受到这种生存的挤压。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起，一直写到现在，这种力量不光在出生的故事里能感受到，在野鸡胡的故事里也一样。野鸡胡监狱是一个喻体，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凝练为一个象形符号——“囚”，这不仅是监狱里的人的命运，也是所有人的处境。

在非逻辑的情况下小说放得很开，作者将自己解放了出来。同样是写个人成长，与路遥不同的是，路遥的个人成长是激励着青少年向上攀爬；而《佛痒痒》则是反观成长，从儿时到成长，向着极端绝望而去。小说里对生活的审视也是两极的，盼望安稳，但写

的全是动荡，是一种向着生存与注定的道道障碍不断磕碰的命运结构。这种写法之下，但凡遇到了生活的沟沟坎坎的时候，小说的文字都笔力非凡。小说里最大的困顿和挤压体现在人的肉身，这个时候简明的语言显得才华横溢。比如他描写侯江潮的未婚妻，“她走路的时候，夹着双腿，裆部、大腿内侧发出‘嚓嚓’的声音，她的眼神不怎么挪移，或者说直勾勾地硬生生地甚为坚定，当她把目光移向侧方，让人觉得仿佛后面拖着一个重物，似乎她要把原先注视的物体连根拔起，带着沉沉的力度。这种目光后来常常被梅昊提起。他说，这个女人的目光像连在绳子上的甩钩，甩出去，拉回来，都要捎带些皮肉。毒啊！要不怎么勾去了六个男人的性命。”这样的语言太刚猛也太真切了，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是力大无比。像这样的地方小说里很多。

由于《佛痒痒》的非逻辑性，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块块碎金的闪耀连缀。写到野鸡胡的屎尿池那里，确实有种邪性的力量，那是全篇力道体现得最足的一个地方。简明写人身体的感觉，“我的身体沉重得好像捆着一头驴”，匪夷所思但是又合情合理。这也体现出陕西的地方性，让一位江南的作家写，是不会有这样的句子的。即便是山东作家也不会把身体和驴绑在一起，这是西北作家特有的想象力。小说里有很多个人文学风格的描绘方式，写人的身体状况异常，他常用“黑色的嘴唇”、“紫色的嘴唇”；描绘男人，他用“胸膛向外腾腾冒着热气”这种方式。

李建军谈论这本书时作了联想，世界上不少经典文学作品都和监狱、犯人有关，他提到了《死屋手记》《第一圈》。还可以有王尔德的《狱中记》，甚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等。劳改生活、囚犯生活和日常社会秩序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是秩序的反叛之路和重新规训之旅。我们生活在秩序中，但又要挣脱秩序，有时不得已向秩序叫板。不得不恨、不得不冷酷，但又不能不爱、不能不伤怀，这就是《佛痒痒》展现出来的矛盾。这是个无法回避的情境，我们活着的情境充满了囚困，挣脱的渴望也就生生不息，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一代代人的命运。每当必须平复内心狂野冲突的时候，蹿上来的很可能就是生命的邪火，而《佛痒痒》就是邪火燃烧的过程：上篇是点燃，中篇是烧红，下篇便是成灰。合上书页，回头细想，另外那层超拔而深切的意会可能就泛上心头：人活一辈子，折腾与被折腾何尝不是常态，到终了之时，每个个体的生命也只是那佛前的一炷香。

作品里碎金缀链的思考，还是归于终极性的问题：我从何而来，我来后怎样，我将归于何处？小说里专门有一个章节叫“然后呢”，他不断地追问“然后”，貌似用调侃的方式稀释了这个念想，而实际上，文本所有的力量都来自对“然后”为口实的终极关切的激情。

（《佛痒痒》，简明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施战军



简明著 佛痒痒

陈忠实先生鼎力推荐

负书草根人物的跌宕命运

陈忠实先生鼎力推荐

负书草根人物的跌宕命运